

# 弗里德曼 “经济学假设非现实性”论题的辨析

□马 涛

(复旦大学 经济学院, 上海 200433)

本文试图从主流经济学研究中存在有“描述性”和“分析性”两种不同范式的角度,对弗里德曼在《实证经济学方法论》中提出的“经济学假设与现实的非相关性”命题进行评析。本文认为,事隔半个世纪,重新检讨这一论战,辨析论战中提出的问题,对更好地理解现代经济学的方法论具有一定的启示意义。

关键词:弗里德曼 经济学假设 现实非相关性 分析性方法

中图分类号:F091.3 文献标识码:A 文章编号:1003—5656(2010)03—0020—08

自20世纪30年代开始,经济学家就经济学的性质与研究方法不断产生分歧和争论。到了20世纪中叶,西方经济学界更是爆发了一场旷日持久的关于经济学方法论的论战。引发这场论战的导火线是美国著名经济学家弗里德曼(Friedman)1953年发表的论文《实证经济学方法论》。在这篇论文中,弗里德曼提出了一个重要的观点,他认为检验一个经济学理论是否有效的唯一标准是其对现实预测与实际数据的比较,而理论假设的现实性则与理论的检验毫不相关。弗里德曼的这一论文发表后立即在经济学界引发了一场有关经济学理论的有效性与经济学假设前提之间关系的论战。在国外,相关这场论争的研究成果较多,多是从科学哲学与方法论的角度立论。国内的相关研究成果较少,代表性的论著是李和平著《弗里德曼论点及其争论研究》。该著搜集整理了国外大量弗里德曼相关论点争论的资料,并从科学哲学对经济学方法论影响的角度进行了探讨,提出“多元性综合分析”说。<sup>[1][2]</sup> 本文拟在前人相关研究成果的基础上试图从主流经济学研究中存在两种不同范式路径的角度重新检讨这一论战,辨析其中的问题,这对更好地理解经济学的方法论可能会有一定的启示意义。

弗里德曼撰写《实证经济学方法论》的目的是就当时对新古典经济学的批评所进行的回应。在《实证经济学方法论》中,弗里德曼列举了一些人们对新古典经济学的批评,其中有一条就是新古典经济学基本假设的非现实性或虚假性。他在论文的第五部分指出,人们把正统经济理论作为一种“非现实”理论所做的大量批评的原因是:1. 它假设人是自私的、唯利是图的,人是“欢乐与痛苦的计算器,其计算速度就像闪电一般”;2. 它建立在旧的心理学的基礎之上,从而必须随着心理学的发展而发展;3. 它假设人(至少商人是如此的)总是处于一种连续的警觉状态,一旦他们那敏感的直觉嗅到供给与需求状况的

基金项目:本文是国家社科基金项目(项目编号08BJL056)的阶段性成果,同时也是“上海市重点学科建设项目资助”成果,项目编号:B101”

变化,竞争是纯粹的,而且商品、劳动力与资本等都是同质的。具体例子就是《美国经济评论》对边际分析问题所进行的连篇累牍的讨论和人们对利润最大化假说的旷日持久的批评。

《实证经济学方法论》一文的思路和主要观点十分清楚,目的是为新古典经济学辩护,反对那种以“假设的非现实性”为依据对新古典经济学理论的攻击。

弗里德曼认为判断一个假说能否成立的唯一标准在于该假说的预测能力,不在于其假说本身的现实性。现实的经济现象十分复杂,人们可以观察到的事实数量上是十分有限的,所以也可能会出现许多的假说。在这种情况下应该以什么样的标准来选择假说呢?弗里德曼提出只能采纳“简洁性”与“成效性”的原则:“一理论越是‘简单明了’,在某一既定领域内对现象进行预测所需要的初始知识也就越少;一理论越是‘富有成效’,它对现象所作的预测也就越精确,而且该理论进行预测所依据的范围也就越大,同时,为了进一步研究的需要,它所要加以说明的东西也就越多。”<sup>[2]198</sup> 在这里,弗里德曼对理论或假说检验采取的是实证主义的标准。既然理论或假说的终极目的是对尚未观察的现象进行准确的预测,那判定理论或假说的有效性标准理所当然也必须以其预测能力来衡量。这一“尚未观察”的现象包括尚未发生的现象、已经发生但观察尚未进行的现象、已经发生而且观察已经作出但利用理论或假说进行预测的人尚不知晓的现象这三种情况。弗里德曼强调“实际证据永远也不可能检验某一假说的正确性,它只能通过无法将该假说驳倒来显示该假说的正确性。当我们说到某一假说已经在实践中得到了确认时(并不十分准确),我们通常所指的就是这个意思。”<sup>[2]197</sup> 弗里德曼承认,社会科学不可能像自然科学那样经受精确的实验检验,而不得不依赖于偶然发生的“实际情况”所提供的证据来进行我们的检验。但他强调社会科学中无法进行所谓的“有所控制”的实验,这并不能反映社会科学与自然科学之间的根本区别。在弗里德曼看来,不能进行受控实验并不是社会科学的独有特色,自然科学中的某些部门例如天文学也同样不能进行受控实验。有控实验与无控实验之间的差异充其量不过是一个程度上的差异,没有哪一种实验是可以完全控制的。所以,弗里德曼认为不能进行受控实验并不是通过假说或理论的预测成功来检验经济学命题的障碍:“实践所提供的证据是大量的,而且常常是确定的,犹如经过了设计的实验一般。”<sup>[2]198</sup>

弗里德曼承认创立一个理论假说的过程从来都不是从零开始的。所谓的最初阶段本身也总是要涉及到对一系列早些时候提出的、以实际观察为依据的假说所进行的比较。这些假说的涵义之间也可能是相互矛盾,但它成了促进人们构造新假说或修改原有假说的始动力。他认为人们对假说的构造过程普遍存在着一种误解,即认为可以对假说自身所做的假设进行检验,检验的标准是其“假设”与“现实”之间的一致性:“这就等于说假定假说不仅具有‘含义’,而且还具有‘假设’,这些‘假设’与‘现实’之间的一致性检验该假说的合理性的标准”。他认为这一为人们所广泛持有的观点“不仅是根本错误的,而且还成了更多的谬误产生的根源。”<sup>[2]201</sup> 其理由是它不仅没有为不合理的假说向合理的假说转化提供捷径,相反却混淆了是非,造成了人们对经验证据在经济理论中的重要性的误解,使得人们为促进实证经济学的发展所作的探索迷失了方向,并且阻碍了实证经济学中人们在试验性的假说上取得一致的意见。他提出,那些真正重要而伟大的假说所包含的“假设”是对现实的一种十分不精确的描述性表达:“一般说来,某一理论越是杰出,那么它的‘假设’(在上述意义上)就越是脱离现实。”这是因为研究者在对具体的现实进行把握的过程中必然要优先抓主要矛盾,舍弃一些次要因素,才能抽象出从总体上代表现实原型的模型:“如果一假说能够通过极为有限的资料而进行大量的‘阐述’,即如果一假说能够从它

旨在解释的那一现象周围的大量复杂且详尽的情况中,抽象出共同且关键的因素,并能保证仅在这些有限资料的基础上作出合理的预测,那么,这一假说就是意义重大的。所以,为了意义重大,一个假说在其假设方面必须运用一些描述性的技巧;既然该假说的伟大成功将证明其它许多的有关情况与该假说旨在阐明的现象毫不相关的,那么该假说也就不必考虑并说明这些情况。”依照弗里德曼的看法,判断一个理论模型是否好的标准,不在于一个理论的“假设”是否是“现实主义的”,而在于这些“假设”对于我们已有的目标来说能否提供更好的预测:“唯有通过考察该理论是否应验,即该理论是否取得了足够的预测水平来进行。”<sup>[12]202</sup>

在阐述了实证经济学的终极目的与理论的检验标准之后,弗里德曼提出了其论点的核心思想,即假设的非现实性是富有意义的理论的必然特征!为了进一步论证他的这一观点,弗里德曼还以物理学中的“自由落体公式”假设真空的存在来论证说明假说的检验与假设非现实性之间的关系。弗里德曼提出经济学家应学习物理学家那样的研究方法去从事研究工作,不要求助于假设是否现实,而应该把精力集中于讨论理论模型在哪些条件下可以应用,即说明其假设可应用的条件。他指责那些批评新古典经济学的“最大化假说”是不现实的假设的说法实际上是说它不能恰当地描述某些经济事件,但判断理论是否正确的根据不在于其假设是否是现实性的、而在于利用其理论假设对未来的预测是否准确。他认为实践已证明了新古典经济学“最大化”理论的正确:“除非商人可以通过这种或那种方法而使其行为近似于成果最大化相一致的行为,否则,他们似乎不可能长久地维持他们的生意。这里不管明显地、直接地决定商业行为的因素是什么——习惯性的反应,随机性的机遇,或难于归类的一些东西——其结果都是一样的。不论什么时候,只要这一决定因素碰巧导致了与合理的、有实际根据的成果最大化相符合的行为,则生意便会兴隆,并进而需求资源以扩大经营;反之,只要这一决定因素不能带来与合理的、有实际根据的成果最大化相符合的行为,则生意将会亏损,且只有从外部引入新资源才能维持存在。”<sup>[12]209</sup>他的结论是,检验一个理论不能靠对其假设的现实性进行判断,而只能依靠从这一理论的假设所得出的预测与其实际经验数据进行比较看是否相近进行判断。新古典经济学的“最大化”假说之所以被人们接受,正是“来自于该假说在特殊问题中的无数次应用,及在这多次应用中,该假说的含义与实际情况并没有发生抵触这一事实。”<sup>[12]210</sup>

弗里德曼还区分了经济学研究中的“描述方法”和“分析方法”。他认为描述方法追求前提假设与现实的一致性和真实性,分析方法则不要求假设前提与现实的一致性和真实性。实证经济学应采用“分析方法”,其目的是对变化的经济环境的结果进行有效的分析和预测,而不应去讨论“假设”与“现实世界”之间是否存在对应的关系。他批评最近一段时间以来,人们对新古典最大化假说所作的批评,就充分说明了在研究方法上存在着“描述方法”与“分析方法”的区别。这些批评者批评的理论依据就是“商人没有,而且确实也不可像该理论所‘假设’的那样去做。”弗里德曼认为这一批评在方法论方面所犯的错误就在于将“描述方法”所追求的准确性与“分析方法”所追求的相关性二者之间的不同进行了混淆,从而“构成了大部分经济理论批评的主要内容。”<sup>[12]220</sup>他认为从“分析方法”看,一个理论或其“假设”不可能是完全“现实主义”的。他以“麦子市场”为例,强调任何分析理论都不可能做到“假设的完全现实性”:“小麦市场的一个完全“现实性”的理论不仅需要包括决定小麦供给状况的因素,还需要提供用来交易的现金或信用工具的种类、交易者的头发与眼睛的颜色、交易者的祖先及受教育程度、交易者的家庭成员人数、种植小麦的土壤状况及物理化学属性等等。如果追求完备的“现实性”,理论根本无法进行建构,也无法

进行应用。他以马歇尔 (Marshall) 为例分析“分析方法”的特点,说马歇尔在研究企业经济行为时就首先假设某行业处于完全竞争或完全垄断这两种状态,但这两种状态是对现实世界中情况的理想化抽象,它们在现实经济中是根本不存在的。“描述方面的准确性与分析方面的相关性的混淆,不仅导致了在许多不相关的方面对经济理论所作的批评,而且还导致了经济理论的误解及在弥补所谓的缺陷的努力中方法性错误。”<sup>[2]221</sup> 弗里德曼分析说,人们对“完全竞争”与“垄断”概念所作的解释,以及“垄断性”或“不完全竞争的”理论的发展,就清楚地反映了经济学研究中的这种倾向。他批评说,有人指责马歇尔的“完全竞争”为假设前提的市场分析理论不符合现实,其错误就在于他们不懂得马歇尔“所追求的是分析世界开辟道路,而不是使现实世界得到摄影般精确的再现。”<sup>[2]222</sup> 批评者的错误在于用“描述方法”去评论马歇尔的“分析方法”。从“分析方法”看,正如马歇尔所述:“不同产品(即不同部门)之间的区分应如何确定这一问题,必须从便于某种讨论的角度来加以解决”,<sup>[2]223</sup> 而不在于假设与前提的真实与否。弗里德曼承认假说应不断发展,认为如果能够创立一种比马歇尔的假说更为一般化的理论,那将是极为理想的,但不能从假说与现实是否是一致或真实的角度来评论和判断理论的优劣。

他论证的最后结论是:从科学分析的角度看,理论假说只是对现实的抽象或虚假的描述,不能通过比较该理论的“假设”与“现实”是否一致来对该理论进行检验,而“只有通过考察该理论所取得的预测,对于我们所要解决的问题来说,是否是足够令人满意的,或者是否是比来自于其它假说的预测更令人满意来作出回答。”他认为以往人们通过揭示理论假设的非现实性而对新古典经济学理论的批评,多是“不相关的,从而,由这种批评所促动的经济理论也大多是不成功的。”<sup>[2]228</sup>

## 二

弗里德曼的《实证经济学方法论》发表后,上述论点不断遭到质疑和批评。这些批评与争论的焦点之一是经济学的假设是否要有现实性。

布劳格 (Blaug) 在《经济学方法论》中对弗里德曼的假设非现实性的观点及其巨大影响作了如下概括:“我们必须从这里转到战后经济方法论的中心著作,这就是实际上每个现代经济学家在他或她的职业生涯的某个阶段都阅读过的一篇论方法论问题的文章:密尔顿·弗里德曼的《论实证经济学的方法论》(1953年)。它的中心论题是经济学家不必为使他的假设‘现实’而烦恼,这就引起了一场争论的风暴,这场风暴几乎整整十年才消失。”<sup>[3]114-115</sup> 弗里德曼的这个论题是那样有名以致甚至成为广为流传的笑话话题。奥布林说在 Belfast 大学的学生告诉了他以下的故事(在此4年前我在曼谷的一个经济学家集会上听到了相同的故事):“一位经济学家、一位工程师和一位化学家被困在一个沙漠孤岛上,他们有一罐火腿,但却没有开罐工具。当工程师和化学家运用科学做各种开罐的试验都失败之后,他们转向一直在一旁面带高人一筹的微笑的经济学家愤怒地问:‘要是你会怎么办?’让我们假设我们有一把开罐刀”,经济学家沉着地答道。”<sup>[3]115</sup> 布劳格在《经济学方法论》中的“结论”部分谈到“现代经济学的危机”时坦言:“在20世纪60年代的十年里,经济学深受公众尊敬,经济学工作者春风得意,这一切都达到了登峰造极的地步。然而,到了20世纪70年代,‘危机’、‘革命’与‘反革命’就充斥了街谈巷议,远远超出了经济学专业中一些主要代言人自我批评。用华西里·里昂惕夫的话来说:‘根据想象、假设,而不是根据观察到的现实不断形成先入偏见,导致了评价和区分学术团体成员实绩优劣的日常价值尺度的混乱。根据这种尺度,经验分析的地位还不如数学公式的推理。’里昂惕夫并且认为,经济学家们对他们所

用的数据的质量太不关心,他把这种态度归罪于工具主义的或“如果……则……”理论模式的方法论之灾难性影响。H. P. 布朗比里昂惕夫走得远得多。他提出“现代经济学的根本错误在于,它关于人类行为的假设全都是随意而定的,那些文献则是飞机上吹喇叭——唱高调”。<sup>[3]269</sup>

对弗里德曼假设非现实性观点进行激烈批评的,还有著名经济学家西蒙(Simon)和萨缪尔森(Samuelson)。

针对弗里德曼认为一个理论越成功其假设就越不现实的论点,西蒙批评说,在弗里德曼的论点中,有关前提与结论的关系可以表述为:只要结论是真的,前提是假也无关紧要。对此,西蒙批评指出,如果一个理论是有效的,则这个理论必须遵循以经验为根据的有效假设。然后使我们在更坚实的基础上来构建一个新的理论。西蒙还指出,真实性是一种动态的追求,不可能一蹴而就,只能逐步逼近。他认为弗里德曼提到的许多物理学家在研究问题时所做的与现实不符的假设并不能证明弗里德曼的“非现实性原则”,例如伽利略对绝对真空的假设感兴趣并非是因为现实世界中不存在绝对真空,而是因为现实世界有时能够充分地近似绝对真空的情况。他提出取代非现实原则的方法论原则——即“近似连续性原则”。根据这一原则,如果现实世界的情况能够与针对某一理想型的假设充分地近似,则从这些假设推演出来的结论就近似地正确。这样,假设的非现实性就不再是科学理论的优点,而是一个摆脱不了的缺点——是科学家受限于有限的计算能力而不得不做出的让步,然而,近似连续性原则却使这一让步能够被容忍。<sup>[4]229-231</sup>对西蒙而言,理论假设的现实性永远是科学家应该追求的目标。

萨缪尔森则把弗里德曼的假设非现实性原则概括为F扭曲。他批评说,前提、理论和推论之间存在一种等价、互相蕴含的关系,因此,如果前提中存在虚假内容,那么这些虚假内容必然要波及到理论及其推论:“认为甚至就可忍受的近似程度而言,在事实上不准确的非现实主义对于一个理论或假说也决不是一个缺点,这种想法是基本错误的。”<sup>①</sup>在一个理论中,经验正确的炸面饼圈构成了它的价值,而面饼圈子中间不真实的洞构成了它的弱点。我把宣称一个理论由于有缺点才更好视为科学的畸形的堕落;并且我注意到,在幸运的科学中,没人作梦要做这种宣称。<sup>②</sup>他认为世界上确实不存在绝对精确之物,但这不能作为我们放松实证有效性的检验标准的借口——无论经济学的命题是否能被经验观察证明为有效。他得出结论:抽象的理论模型犹如建造建筑物的脚手架,但建筑物自身必须站得住脚。如果抽象模型中包含了违反经验的虚假,则我们就必须抛弃这些模型,而不是掩饰它们的不足。<sup>[4]236</sup>

西蒙和萨缪尔森之外,库普曼(Koopmans)与莫利兹(Melitz)也是反对利用虚假假设的经济学者。库普曼虽有试图调和两种争论论点的倾向,但也认为经济学应当与任何实证科学一样要通过观察与推理的不断相互作用来取得进步。这也就意味着构筑经济理论与构筑任何实证科学理论一样包含着两个阶段,第一个阶段进行观察,对观察到的事实进行归纳,然后得到基本的假设或前提,假设所包含的某些术语,是分析在经验世界中发现的人、组织、事情、行动或状况的代表或对应物。第二个阶段则是进行推理,是在第一阶段得到的假设或前提的基础上,通过逻辑规则并在适当之机使用其他的数学技术得出命题或结论。有意义的分析需要一些先决条件,这些先决条件是由可与观察现象的术语相联系的定义、陈述或描述来确定的,而这些定义、陈述或描述就是对术语“解释”。如果没有这些解释,假设只不过是术语表达的未指明实体之间逻辑关系的空洞陈述。相反,如果某些公理的理论概念缺乏直接的经验意义,那么,包含相同陈述的推论也将缺乏意义并不能被直接观察所证伪。库普曼的结论是,经济模型的

<sup>①</sup>转引自马克·布劳格. 经济学方法论[M]. 黎明星、季勇译,北京:北京大学出版社,1990. 123,124.

现实性取决于所采用的假设或前提的现实性,假设的现实性又在于其直接涵义或派生涵义与观察相吻合或者至少不发生矛盾。我们已经熟悉的理论本身能够作为一种给人深刻印象的富有价值的演绎思想体系而存在,这些理论建立在一些似乎经过精心选择的和最接近于复杂现实的前提之上。在人们接受这些理论的情况下,这些理论得出的结论与经济政策问题极为相关,因此这些理论令人惊异的显示出演绎推理的威力。<sup>[15]151</sup>莫利兹也持相同的看法。他认为,即便不精确的假设可以被容忍而且确实显得巧妙,假设的非现实性仍然是一个严重的缺陷。这是因为假设中的每一点虚假要么阻碍对其进行的检验,要么潜在地导致虚假的理论和预测。因此,对一切经济学的假设(无论其所属领域)进行检验是有价值的,这对经济学意义深远。<sup>[6]39-59</sup>

### 三

仔细分析弗里德曼的相关论述,不难发现其论述中不时充满矛盾和不一致之处。例如,在《实证经济学方法论》中,弗里德曼没有对假说或理论、假设的类型进行明确的区分,甚至是在同种意义上使用了“假说”(hypothesis)和“理论”(theory)这两个术语。在弗里德曼的心中,理论就是永远也无法得到最终证明的“假说”,因而也就不存在一种所谓从假说上升到理论的发展程序。这就不能不引发学者们的质疑和批评。例如罗特温(Rotwein)就区分了两种不同类型的假说:定律性假说(law hypothesis)与理性论假说(theory hypothesis),并界定定律性假说的前提或假设所指的实体是具有可观察性的,或者以目前的手段而言是可观察的;界定理论性假说所包涵的实体具有不可观察性,或者是变量的定义所包涵的某些重要涵义是不能用观察加以确认的。由于不能够被观察到,理论假说仅能够通过它们针对其他现象所蕴含的涵义或所做出的预测来验证。因此理论和假说意味着不同的东西。各种规律有着概括程度的区别,当规律的概括程度越来越高,它们迟早也就会进入到理论假说的领域。正因为假说与理论不同,所以定律性假说与理论性假说也就不能以同样的方式进行检验。既然理论假说和定律假说的验证方法并不相同,为什么还要考虑理论的“有效性”呢?罗特温认为这首先是由于我们追求能够解释一切现存定律的理论;其次,新的定律其实可以从原有的理论中演绎出——即有效的理论指导我们进行一些从未进行过的实验,这些实验会产生一系列新的“恒定关系”。<sup>[7]570-573</sup>

如何评价弗里德曼“假设非现实性”的争论?从科学哲学的方法论的角度看,西蒙、萨缪尔森、库普曼和罗特温等人秉持的是科学实在论的立场和观点,弗里德曼所秉持的则是反实在论的立场和观点。从自然科学史的发展来看,整个自然科学的发展史一刻也离不开假设的发展。从亚里士多德对物体运动原因的描述,到伽利略的比萨斜塔实验,从托勒密的地心说到哥白尼的日心说,从道尔顿的原子论到门捷列夫元素周期律再到电子的发现、夸克理论的提出,从燃素说到氧化说,从光的粒子说到光的波粒二象性学说,这些发展无一不体现出科学基本假设的以旧换新、层层进步。在这些发展过程中,我们可以发现科学基本假设向现实的逐步“逼近”为科学提供了很大的原动力,但也可以发现,在科学假设提出的初期要求对其现实性进行一一的检验也很难做到,如果不放松这一要求,也很难取得科学的进步。

具体到主流经济学理论体系而言,我们发现存在着两种不同的方法论研究范式:一种类似于弗里德曼所说的“描述性方法”,我们不妨称之为是描述性命题。这一命题的建构过程实际上也就是其假设逐渐接近现实性的路径过程。即使就这一研究范式的模型而言,高度的简化和抽象虽然不能要求假设与现实的一一对应,但从本质上讲,模型的假设前提要求与现实真实世界的本质相接近,或是现实真实世

界“足够好的近似物”，而决不能是为了理论建构的便利而随意异化对现实世界的抽象。从这一研究范式的发展路径来看，西方经济学学说史上的每一次重大进步都往往要归功于对传统经济学假设前提向现实的还原。例如马歇尔之后张伯伦(Chamberlin)和罗宾逊(Robinson)在对市场的认识上修改了马歇尔关于市场充分竞争的假设，提出了垄断竞争和不完全竞争的理论。在西方经济学史上还存在着一个对人的“理性假设”逐步放松和逐步接近现实的过程。例如“凯恩斯革命”就是否定了传统古典经济学中关于未来是可知的完全理性的前提假设，修正为未来是不确定的有限理性假设，并以此作为其理论体系的前提，演绎出了边际消费倾向递减、资本边际效率和流动性偏好这三大心理法则，创建了宏观经济学体系。这一切诚如凯恩斯所说：“我对经典经济学的批评并不在于其分析有什么逻辑错误，而在于该理论暗含的几个假设很少或者从来没有满足过，故不能用该理论来解决现实问题。”<sup>81326</sup>西方经济学史的发展一再表明，纯粹的非现实的理论模型发展到了一定的地步，现实性考虑对于现实问题的解决要更有用处。本文不反对弗里德曼提出的经济学的研究首先是通过抽象假设把复杂多变的现实世界简单化的做法，但纯粹的非现实的理论模型发展到了一定的地步，就必须在认识简单世界的基础上不断通过修正、还原假设前提，以使理论向现实经验世界逼近。经济学进行理论建构所依据的逻辑前提要尽量接近经验世界。还要强调指出，不能因为强调经济学前提假设必须从简化抽象开始，就对现实世界不加限制地进行简化和抽象，甚至为了理论建构的便利而高度异化对现实世界的抽象。这也是目前经济学研究中存在着的一种通病。

也不能否认，西方主流经济学研究范式中还存在着另外一种路径，即完全非现实的理论模型发展，这种模型先是假设某些理想状态，然后检查现实与这些模型的差距以便改进现实状况。在这种情况下，现实并不是修正理论的依据，恰恰相反，理论成了改善现实的参照标准。这相当于弗里德曼所说的“分析性方法”。例如西方经济学中的阿罗—德布鲁一般均衡模型、莫迪格里亚尼—米勒定理(简称MM定理)就是这一研究范式的典型体现。阿罗—德布鲁一般均衡模型的核心思想是说明经济体制同经济效益不相关性。在讨论市场经济时，此模型前提假设一是市场完备，二是不存在不对称信息。只有这两个基本条件得到满足，才会存在这种不相关性。阿罗—德布鲁一般均衡模型是新古典经济学方法论的典范，虽然这个定理的假设和现实“不相关”，但它提供了一个基准，人们可以在此基础上进一步分析和认识经济体制与经济效益之间的关系。MM定理的核心思想是说明金融工具同效益的不相关性，此定理可表述为：公司不论用举债还是发股的方式融资，从利润的角度看其结果是一样的。其前提假设条件是厂商与投资者间没有不对称信息；股息与资本所得都不征税；买卖证券无成本。MM定理的贡献是为人们认识金融工具、金融体制提供了理论基准：当金融工具同利润不相关时，金融体制同效益也就不相关了。为什么现实中不同的金融工具收益不一样，以MM定理为指导，就要寻找现实中是什么违反了这一定理的假设条件。<sup>①</sup>这两个模型的共同特点是假设在某些理想状态设计出模型的内在相关的逻辑关系，然后检查现实与这些理想模型的差距而改进现实状况。它很容易引起人们的批评，即认为这些经济学理论是不现实的、或理论的前提假设是不现实的。这也即是弗里德曼所说的，新古典经济学中的这类理论模型的问题不是假设是否现实而是应该说明其假设可应用的条件：一种可能性是当处于其可应用的条件时新古典经济学就可以应用，而在其他情况下就不能应用。在这种情况下，现实性并不是修正理论

<sup>①</sup>上述两个“不相关性”的理论模型参见钱颖一《理解现代经济学》和许成纲《经济学、经济学家与经济学教育》，收入王小卫、宋澄宇编《经济学方法——十一位经济学家的观点》，上海：复旦大学出版社，2006年，第43页，第75页。

的依据,而是恰恰相反,理论恰恰成了改善现实的参照标准。它为人们提供了看问题的新视角,指导人们避开细枝末节,把注意力引向关键的、核心的问题,它有助于帮助人们在判定碰到问题时从什么地方入手。比如看到经济体制问题时,阿罗—德布鲁模型告诉我们经济体制不相关,它帮助我们寻找在阿罗—德布鲁模型之外,是什么东西影响了经济绩效,例如是否合同不完备,是否有不对称信息等。这些模型的贡献是为我们研究经济问题提供了理论的基准或参考系。在经济观察能力的培养中,能够训练的部分就在于掌握这些理论基准,有了“基准”,就知道寻找解决问题的方向了,这就是理论基准的作用。

实事求是地说,在西方主流经济学中这两种研究范式的理论都存在。结合西方经济学史的发展实际来看,在一个新的理论或“革命”的创立初期,为了创新,自由探索,大胆猜想,经济学的前提假设往往会采用与现实不相关的研究方法。例如马歇尔的垄断与完全竞争的市场理论,就是经济学理论假设中忽视其现实性的案例。在这一时期,经济学家需要根据有关研究问题充分发挥想象力,提出理论假说,然后再回归经济现实,寻求检验,进行证伪。没有被证伪的理论假说就暂时为人们所接受,被证伪了的就会被放弃。依照波普尔的看法,科学理论的发展就表现为一种不断提出假说,不断进行证伪的动态过程。<sup>①</sup>至于这些前提假设是否合乎现实,最初大多顾不上考虑。类似的例证在科学史上也可以找到许多。例如爱因斯坦提出狭义相对论的初期很少得到支持,原因是相对论的假设得不到人们的承认,但相对论又被人们广泛接受的原因是其预测准确度超过了牛顿力学。这就与弗里德曼的观点非常相近。但随着常规经济学的发展,经济学发展的方向则是前提假设开始向现实回归,例如出现了张伯伦和罗宾逊的寡头垄断和不完全竞争的市场理论。弗里德曼未对上述这两种研究范式加以全面具体区分,就断定说“一般说来,某一理论越是杰出,那么它的‘假设’(在上述意义上)就越是脱离现实(引者注:着重号为引者所加),无疑有了表述上的模糊不清和逻辑上不严密的缺陷;以第二种研究范式概括一切,也未免有失偏颇。”

#### 参考文献:

- [1]李和平. 弗里德曼论点及其争论研究[M]. 北京:中国经济出版社,2005.
- [2]弗里德曼. 弗里德曼文萃[C]. 北京:北京经济学院出版社,1991.
- [3]马克·布劳格. 经济学方法论[M]. 北京:北京大学出版社,1990.
- [4]G. C. ARCHIBALD, HERBERT A. SIMON PAUL A. SAMUELSON. Discussion[J]. The American Economic Review, 1963, (2): 53.
- [5]贾林·库普曼. 关于经济学现状的三篇论文[C]. 北京:商务印书馆,1992。另见 KOOPMANS J. C. THREE Essays on the State of Economic Science. New York: McGraw-hall Book Company Inc, 1957.
- [6]JACK Melitz, Friedman and Machlup on the Significance of Testing Economic Assumptions[J]. Journal of Political Economics, 1965, (1): 73.
- [7]EUGENE ROTWEIN, On The Methodology of Positive Economics[J]. Quarterly Journal of Economics, 1959, (4): 73.
- [8]凯恩斯. 就业、利息和货币通论[M]. 北京:商务印书馆,1999.

(收稿日期:2009—11—12 责任编辑:杨锦英)

<sup>①</sup>参见波普尔著《猜想与反驳——科学知识的增长》,傅季重等译,上海:上海译文出版社,2005年,第367-368页。